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 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发展

黄 庆 璋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关系到这一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它决定着这一革命的整个进程、结局与前途。

毛泽东创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系统理论,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垄断以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教导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地参加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并且在当前的运动中坚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坚持自己的根本利益,坚持运动的未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应在民主革命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工人政党组织,并使其每一个支部成为工人联合会的核心,以避免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他们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结合西欧的情况,提出并阐明了工农联盟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应努力使广大农民承认自己的先锋队地位,否则革命就不能前进。但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不成熟,革命的领导权始终是落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不管自觉与否,总是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则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认为,多少还是难以避免的。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根据俄国是一个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惯于妥协和叛卖的本性,他们希望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一切旧制度的残余,力图防止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革命所提供的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反之,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它比资产阶级更愿意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明确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应当而且能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已丧失领导民主革命的资格,而农民则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论断,创造性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原理,奠定了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基础。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所应采取的态度和争取领导权的思想。从第一次人民大革命时期党内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起,他就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学说,并逐步形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问题的完整理论。

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是列宁早就提出的命题。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应该怎样理解和贯彻列宁的这一原理，却是党的历次大会包括第三次大会所没有解决的。那时，党的许多领导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考察中，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基本观点，但并未被党的指导机关所重视和采纳。相反，彭述之却写文章说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陈独秀对领导权则一贯持消极态度，他不知道无产阶级领导权要争取，更不知道关键是要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去争取领导权^①，他的“二次革命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终于在政治上发展成为放弃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毛泽东在1926年3月、9月和1927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中，集中了我们党在领导权问题的理论成就，表明了党内正确方面同陈独秀右倾错误在领导权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深刻分歧，提出了自己精辟独到的见解。

在参加国民革命的各阶级中，无产阶级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和尾巴而参加革命呢，还是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为着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参加革命？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全局出发，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他不仅分析了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工业无产阶级的高度集中和经济地位极端低下的特点，明确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②而且还深入具体地分析了无产阶级在争夺领导权斗争中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还考察了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及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区别，指出它们之间“性质完全不同”。前者要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他说，由于时代的不同，现在的中国革命与辛亥革命性质也是不相同的。^③这种分析，为后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同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是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合作形式建立起来的，这种情形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困难在于强调以改组后的国民党为旗帜吧，势必影响共产党的地位；不强调吧，共产党员又加入了国民党并以它作为自己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事实上，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从理论到实践，都未能正确地解决好这个问题。针对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毛泽东认为，我们既然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那么，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在国民党里面起领导作用。他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应当是去做主人的，而不是去作客的。^④这一思想是很杰出的，它形象地指明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等右倾“作客”思想的错误实质，对我党以后加强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有着很大的教益。

毛泽东进一步研究了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民主革命领导者的两个基本条件，即正确对待农民和正确对待资产阶级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他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封建地主阶级在这一结构中地位的剖析，指出封建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⑤，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命题的真谛；他分析了农村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权力结构，提醒革命者对农民的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和武装问题要给予高度的关注，无产阶级要实现民主革命的领导，就必须对这些问题

有个清醒的认识，当各地农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而迅猛发展起来时，他反复强调农民问题已经成为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他问道：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他认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又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最终分界线。所谓领导权问题，实质上是对农民的领导问题。象毛泽东这样尖锐地提出加强对农民运动领导，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关于正确对待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对于分清敌友，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得失，具有严重的直接的意义。俄国 1905 年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在实行孤立自由资产阶级这一政策条件下实现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但是在中国条件下，应该怎样看待与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呢？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革命最困难的战略策略课题。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份是买办阶级，它们同地主阶级一样，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的附庸，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一部份是中产阶级即后来所称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对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当工农群众奋起参加革命而威胁到他们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之间，在阶级斗争猛烈展开的时候，他们由动摇而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的分析，正确地解决了分清敌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党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虽然这时他还没有直接提出对资产阶级应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但它已为早晚得出这个原则准备好了必需的成份。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时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总的说来，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党应如何去争取实现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如何去搞武装斗争，都还处于摸索之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

从 1927 年革命的失败到 1935 年党的瓦窑堡会议，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经受住了极端艰苦复杂的锻炼，在实践上对关系到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经验独创性地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

首先，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时进一步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大革命失败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这种情况影响到党内，使许多人对革命性质这一严重问题搞不清楚。他们也提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往往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或立即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民主主义革命，从而在实际上混淆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区别，放松了当前任务的努力。毛泽东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⑦。他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党的本身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能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有着决定的意义；党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才能把革命、革命军队和革命武装斗争领导好，从而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在极端困难的农村环境下的领导作用。^⑧

有个清醒的认识，当各地农民运动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而迅猛发展起来时，他反复强调农民问题已经成为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他问道：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他认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又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最终分界线。所谓领导权问题，实质上是对农民的领导问题。象毛泽东这样尖锐地提出加强对农民运动领导，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关于正确对待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对于分清敌友，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得失，具有严重的直接的意义。俄国 1905 年的革命，无产阶级是在实行孤立自由资产阶级这一政策条件下实现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但是在中国条件下，应该怎样看待与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呢？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革命最困难的战略策略课题。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份是买办阶级，它们同地主阶级一样，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的附庸，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一部份是中产阶级即后来所称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对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当工农群众奋起参加革命而威胁到他们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们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之间，在阶级斗争猛烈展开的时候，他们由动摇而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的分析，正确地解决了分清敌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党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虽然这时他还没有直接提出对资产阶级应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但它已为早晚得出这个原则准备好了必需的成份。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时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总的说来，党还处于幼年阶段，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党应如何去争取实现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如何去搞武装斗争，都还处于摸索之中，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

从 1927 年革命的失败到 1935 年党的瓦窑堡会议，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经受住了极端艰苦复杂的锻炼，在实践上对关系到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经验独创性地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

首先，在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时进一步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大革命失败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这种情况影响到党内，使许多人对革命性质这一严重问题搞不清楚。他们也提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往往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或立即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民主主义革命，从而在实际上混淆了两个革命之间的区别，放松了当前任务的努力。毛泽东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⑦。他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的，党的本身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能否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有着决定的意义；党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才能把革命、革命军队和革命武装斗争领导好，从而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在极端困难的农村环境下的领导作用。^⑧

1935年华北事变后，毛泽东全面地重新估计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中国红军长征胜利所造成的新局面，给党内在过去长期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悲观主义以驳斥，同时提出了壮大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心力量之必要，以避免1927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不努力扩大革命主力军而只依仗当时同盟者国民党的错误。^⑨右倾放弃领导权，“左”倾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为“无兵司令”、“孤家寡人”，一个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一个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在放弃领导权这一根本点上，两者实质是一样的。^⑩党已经取得了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注意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经验了。在解决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已提出了理论基础。

其次，无产阶级在城市斗争遭到失败的条件下，能否保证自己对农民的领导呢？又怎样实现这种领导呢？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出过的问题，需要独创性的解决。在土地革命战争开始时，关于由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的思想，毛泽东也还处在认识过程中。^⑪但是，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在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⑫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从1930年以来，在党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反对“本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使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日趋完善：一方面形成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其主要内容为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⑬一方面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解决了在分析农村阶级问题上发生的许多争论，纠正了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为后来全面解决土地问题创造了条件。

再次，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这对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是非常重要的。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结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但是，当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了革命，无产阶级是否就可以不必正确认识资产阶级而稳操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呢？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是可以的。他们都低估了党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甚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并照搬苏联经验，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从无产阶级实现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高度，澄清了许多混乱思想，进一步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他指出，在蒋介石国民党建立新军阀统治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独立，反对侵略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⑭。在长征胜利和“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发展了早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一科学概念）的分析，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不同的，他们“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新环境下，态度是可能发生变化的。他强调指出：认识这点对于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⑮毛泽东的精辟分

析,形成了党所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原则的理论基础。

总之,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基本思想,提出于大革命时期,在极端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得以逐步形成和发展,但这时它还没有完整地形成。它系统地发展成科学的体系,并达到成熟阶段,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二

从1935年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极端曲折复杂的时期,也是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时期。在这十年间,既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民族斗争,又有尖锐的阶级冲突,二者形成一种奇特的交错,而且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情况又和复杂的国际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党凭借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始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及时地纠正了党内的错误倾向,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一方面胜利地进行了同资产阶级争取对农民的领导权的斗争,一方面又进行了同大资产阶级争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阵地,使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为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是毛泽东领导权理论得到系统总结、多方展开的大发展阶段。

在这个毛泽东思想大发展的阶段,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在哪些方面得到系统地总结呢?它比以前更加发展和成熟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面地阐明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大意义。如果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地解决了二战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方面领导权责任的话,那么,第二年,即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则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总结了关系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斗争问题的丰富经验明确指出民族革命、战争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这一专著中指出,不仅过去了的两个阶段的革命战争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阶段也必将是这样。他说,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自私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就是作为革命战争主力军的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由于小生产者的特点,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也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他强调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向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①⑥}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任何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重重困难险阻,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之途。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领导问题,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他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曾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①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一再地这样提出问题。同时他还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中复杂的阶级情况,针对共产国际要我党屈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和党内王明新投降主义错误,反复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并且发展这个阵地。^{①⑧}

其最后目标就是要把抗日战争的结局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中，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世界历史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所引起的中国历史的根本变化出发，深刻而详尽地说明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指出了在这种变化之前的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变化之后的中国革命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的观念。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他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主义”的概念，^⑩同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并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以后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概念深刻而明确的反映了我国正在开展的民主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本质特征，从而指导人们更深刻的认识和参加这个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首先就在于领导权的不同。正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才根本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性，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可能性等等。

第二，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军，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争论的主要分歧，便是农民问题，“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⑪领导农民完成以土地制度的变革为中心内容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基本是因为他们不能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害怕农民革命，甚至反对农民革命。党内各种形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和曲解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都是同农民问题相联系的。他们或者是否定农民的重要地位，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从而直接否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一战时期的陈独秀和抗战初期的王明新投降主义就是这样；或者用“左”的形式，害怕承认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和所谓“富农路线”，结果歪曲了当前革命任务，使革命势力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从而在实际上否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就是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实质。

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过程中，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工农联盟问题联系起来，对这些经验作了系统的精辟的理论概括。他提出并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又是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盟；党领导的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发展这个基础力量，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总方针的中心一环；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在抗日时期，党领导农民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农民在军事上的联盟形式；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农民是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新民主主义的大众文化在实质上就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等等。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说明，构成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理论完整体系的核心部分。其中许多基本的原理不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普遍的现实意义。

第三，系统阐明了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可能实现对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的科学理论，是同正确分析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紧密联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明确地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世界的历史特点出发，说明了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由资产阶级转换为无产阶级了，说明了这种转换的历史必然性和它极其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担当不了这一领导者的职责了。

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呢？对这个问题，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作了一些原则的论述而没有作直接的说明。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由于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由于党一再遭到“左”倾的袭击，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是，对资产阶级的两部分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变化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而不是资产阶级能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在整个国际范围内，不仅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参加了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极力地争夺领导地位。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的问题作了深入、全面的阐明。他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革命史上，他们不仅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而且历来也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束缚，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还是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异常的软弱性，使得他们又具有对于敌人的妥协性的特性。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五四前后历史地位的变化，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点，分析对比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所共同具有的一般规律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取得人民的信仰。他得出结论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②1}

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是说它就不同无产阶级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了；说领导责任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也并不是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周恩来说：“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②2}中国的特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不是象俄国1905年的革命那样采取孤立、排斥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争取它到统一战线中进行，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就必须执行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强调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强调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等。很明显，毛泽东的上述论述，把他在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有关思想，大为发展和完善了。

第四，总结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经验。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指出：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的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其次，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成为实现这些口号规定的具体目标而积极奋斗和无限忠诚的模范。再次，在原则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适当的关系，发展与巩固这个同盟。最后，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②3}执行这四个基本条件，是无产阶级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是使革命获得彻底胜利而

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所破坏的基础。

抗日时期，党严格执行了这四个基本条件，从而保证了无产阶级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总结。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②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他特别强调：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党面临着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正是这种斗争构成了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在这新的时期，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理论继续得到了发展。

无产阶级要将自己对于革命的领导权，由可能变为现实，首要的问题是处理好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在中国则是要处理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处理好这种关系，不但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同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使它同中国的特殊的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里，本本上面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搬用别国经验，也难免要碰壁。党在处理这种关系过程中，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到抗日战争时期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从而不仅使农民革命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获得了广泛的发展，而且使资产阶级也一天天地倾向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资产阶级更是进一步地倾向我们。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党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并且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期，他提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政治领导的四个条件，这是侧重在无产阶级本身的领导责任而提出的要求。抗日时期，他又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条件：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③。党根据这些原则，在放手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前提下，谨慎地注意照顾了中间势力的利益。在解放战争发展到大决战的前夜，毛泽东又将上述思想概括成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两条准则。他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二者缺一，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领导。^④这两个必备条件，不仅适用于无产阶级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适用于无产阶级处理同农民的关系。它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的领导、以及在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争夺对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的斗争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它是毛泽东关于领导权理论在新条件下的一个重大发展。

无产阶级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建立和发展工农联盟，不但在革命势力处于劣势时有着决定的意义，就是在民主革命取得决战胜利后，同样具有着决定意义，而且问题还更为突出，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并不是希图把革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这一阶段上，而是要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把这一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这一点，则是参加民主革命的广大农民在思想上准备不足的。

为了在新形势下夺取全国的胜利，从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作好充分准备，毛泽东进

一步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把这个总路线和总政策概括为以下的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②⑦}与1939年首次正式提出民主革命总路线相比，增加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容，这是由于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已经最后形成，并且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这条总路线中所提的人民大众，主要指的就是农民。这个革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们。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由此形成的工农联盟，才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彻底胜利和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⑧}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民主专政，当然也是以工农为阶级基础，在抗日时期，毛泽东把这个革命的政权，叫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在这时又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党是通过领导农民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来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经过十年土地革命，后来又经过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和解放战争前期及中期的土地斗争，党对土地改革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经验越来越丰富。到了1948年春，毛泽东在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同时，又完整地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②⑨}为了贯彻这条总路线，他一方面反复强调必须不断地加强对农民的教育，采取适合农民觉悟程度的形式逐步地把他们组织起来，不仅使他們为完成民主革命而奋斗，而且要采取谨慎的、逐步的、积极的方针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前进。无产阶级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农民的水平，而是要把农民提到自己的水平。另一方面，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他强调要自始至终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不能采取由上面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恩赐土地给农民，而要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开展激烈的反封建斗争来掌握农村政权，分得土地。毛泽东根据二十多年来党领导土地改革经验作出的这一系列科学总结，指导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和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他从中国政治上、经济上的特点出发，阐明了在这个国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各种经济成份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对革命战争和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应发展成为对全国政权的领导。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权，是我们国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是毛泽东关于领导权理论和我国人民革命斗争成果的集中表现，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开辟了道路。

*

*

*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理论，集中地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典型意义。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它对于我们现在和今后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二大后，五届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中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把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所形成的根本经验写进了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全国人民非常拥护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固定了下来，为今后坚持四项基本原理提供了最权威的根据。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领导权，必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注 释：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18、169 页。
- ②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 年 9 月 1 日。
- ③ 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 年 1 月。
- ④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纪录》。1927 年 8 月 7 日。
- ⑤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 3 月。
- ⑥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 年 11 月 25 日。
- ⑦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
- ⑧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 年 12 月。
- ⑨⑩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 年 12 月 27 日。
- ⑪⑫⑬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20、179、216 页。
- ⑭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 5 日。
- ⑮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会上的报告》。1934 年 1 月。
- ⑯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 4 月 20 日。
- ⑰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 年 12 月。
- ⑱⑲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年 5 月。
- ⑳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 年 11 月 12 日。
- ㉑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 年 5 月 4 日。
- 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
- ㉓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
- ㉔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 10 月 4 日。
- ㉕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 年 3 月 11 日。
- ㉖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 1 月 18 日。
- ㉗㉘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1948 年 4 月 1 日。
- ㉙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

（上接第26页）

- ⑨ 李立三：《在全国总工会特派员会议上的政治报告》，1930年 3 月。
- ⑩ 王 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 2 月。
- ⑪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
- ⑬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 5 月。
- ⑭⑮⑯⑰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1 月。
- ⑱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 5 月13日。
- ⑲ 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 2 月。
- ㉑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
- ㉒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 ㉓㉔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 6 月。
- 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 3 月。
- ㉖㉗㉘㉙㉚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 6 月。
- ㉛ 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 9 月。
- ㉜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6 月27日。
- ㉝ 毛泽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 8 月。
- ㉞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 6 月15日。
- ㉟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 6 月14日。
- ㊱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 ㊲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